

■马克思主义哲学

论社会转型时期价值冲突的根源与价值观重建

姜锡润, 王 曼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姜锡润(1955-), 男, 湖北武穴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唯物史观、社会认识论、人学和价值论研究; 王 曼(1982-), 女, 安徽砀山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生, 主要从事人学和价值论研究。

[摘 要]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冲突根源主要有三点, 基于此, 可以发现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存在两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是市场经济的动力问题, 二是市场经济的方向问题。文中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试图据此寻找出走出我国当前价值冲突困境的途径。

[关键词] 社会转型; 价值冲突; 价值观重建

[中图分类号] B0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5)02-0149-07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 因价值观念的日趋多元化而导致的价值冲突不仅仅是一个观念问题, 而且是一个社会现实问题。能否走出当前价值冲突的困境, 关系到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转型的成败。因而, 构建新的价值观体系成为时代课题。那么, 我们必须思考: 价值冲突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观念? 到底应该怎样构建新的价值观体系?

一、转型时期价值冲突的根源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 “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变迁和发展。”^[1] (第 23 页) 这种社会转型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转型, 它将引起整个社会全面而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反映到人和社会的观念层面, 则表现为价值观念的冲突和更新。转型时期价值冲突的根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 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社会改革引发社会转型的关键在于改变了社会利益结构, 改革的实质就是改变社会的利益关系”^[2] (第 31 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国家几乎是惟一的利益主体, 国家的利益就是个人和集体的利益, 国家的价值观就是个人和集体的价值观。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都处于政治形态的掩盖之下, 政治领域的价值观就是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的价值观。市场经济强调主体的自主性、自由性和创造性, 国家不再是惟一的利益主体, 利益结构出现多元化的趋势。主体的特殊利益决定其特殊的价值观念,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价值观的多元化, 价值观的多元化又势必引起价值冲突。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从政治形态下突显出来, 以政治为主的价值取向转为以经济为主的价值取向, 不同领域的不同价值取向也引发着价值冲突。

(二) 中国在社会历史中的尴尬处境

从中国国情看, 中国处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现代文明)的转型时期。从世界历史看, 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处于由工业文明(现代文明)向后工业文明(后现代文明)的转型时期。由于当代世界社会交往的扩大和信息传媒的发达,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迅速地传入刚刚开始现代化进程的中国,从而使农业文明、现代文明和后现代文明依次更替的历时的文明形态以共时的方式摆在中国的面前,使中国陷入难以逃避的尴尬境地。农业文明条件下的自然经济同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相连,以抑制个体性和主体性为特点,其价值取向主要有集体主义、整体主义、客观主义、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等;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以提倡个体性和主体性为特点,其价值取向主要有个体主义、参与意识、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技术主义、消费主义等;后工业文明以消解个体性和主体性为特点,其价值取向主要有生态主义、交往理性主义、技术批判主义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特别是那些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价值观念在中国同时存在并相互争夺,从而造成了价值冲突。

(三)社会主导价值观念阙失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主导价值观念是集体主义。在社会转型时期,集体主义已不再能发挥主导作用,而新的主导价值观念又没有建立起来,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处于阙失的状态。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有二,首先是人们对集体主义的误解和厌弃。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体主义是一种极端化的集体主义,它片面强调国家、集体、全局的利益,严重忽视地方、个人、局部的利益;片面强调人的义务、责任、奉献、社会价值,严重忽视人的权利、尊严、索取、自我价值;片面强调政治斗争、精神力量、理想道德的作用,严重忽视经济建设、物质力量、物质利益的作用。这种极端的集体主义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的“共同贫穷”,另一方面导致了人们对集体主义的误解和厌弃。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的阙失意味着社会失去了统一的价值标准,再加上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和多种多样价值观念的并存,社会的价值冲突日益剧烈。

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是价值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社会改革的必然结果。中国当前独特的历史处境和人类环境,使原本历时性的各种价值观念以共时的形态突显出来,使我国价值领域的状况更为复杂;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的阙失是价值冲突的直接原因。因为一个社会如果存在强有力的主导价值观念,即便出现了价值冲突,也会因主导价值观念的协调作用而消解。这三个根源都是由社会转型引起的,因此,要走出当前价值冲突的困境,重建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就必须从社会转型本身寻找出路。我国的社会转型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其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工业文明,这一目标决定了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构建新的价值观念体系,一是从工业文明建设出发,确立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为核心价值观念;二是从我国的国家性质出发,确立集体主义为主导价值观念。

二、转型时期核心价值观念和主导价值观念的重建

我国当前的价值冲突及其引起的道德失范、价值危机等现象,其实是文化转型的一种曲折表现,它表明社会的整个价值观念正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这时,对个别价值观念的调整以及通过道德谴责、舆论制约、法律规范等手段对价值失范的纠正,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价值危机的现状。要改变这种状况,只能重塑一种新的文化精神,重构一种新的价值体系。考察一下历史上存在过的价值观念体系,我们发现,任何一种价值观念体系都有其特定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主导价值观念。核心价值观念和主导价值观念是价值观念体系的灵魂,如果它(们)被动摇或丢弃,整个价值观念体系的大厦就会分崩离析,从而导致价值冲突和价值危机的出现。因此,要重构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体系,首先必须选择和确定这种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主导价值观念。那么,在社会转型时期,彷徨的中国社会所亟须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主导价值观念到底是什么呢?

(一)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启蒙与确立

任何观念的东西都产生于实践,并且只有能够指导实践、促进实践发展的观念才是先进的观念,价值观念作为观念的一种也是如此。因此,构建新的价值体系也要坚持实践的方法,从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中寻找答案。

中国当前最大的实践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努力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划分从本质上看是生产力不同阶段的划分。虽然工业文明已经显露了很多弊端,但较之农业文明而言,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中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不能超越工业文明而直接进入后工业文明。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大体上要经历三个阶段或三种形态,即从“人的依赖关系”形态,发展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再进展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形态^[3](第104页)。通俗地说,这三个阶段分别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社会经济阶段;与此相对应的三种社会形态则分别是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和未来社会。“‘现代化’是任何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都避开不了的道路。”^[4](第265页)另外,从国际形势看,“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国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因此,工业化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要建设工业文明,就必须引进工业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下有很多价值观念,如个体主义、参与意识、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技术主义、消费主义等,有些价值观念是积极的,有些价值观念是消极的;有些我们必须采取,有些我们必须扬弃。但是,其中有一种价值观念是我们必须采取的,这就是工业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近年来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但是,二者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究竟是一个东西,还是两个东西?二者之间是相互对立的,还是相互统一的,抑或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学术界并未达成一致的意见。抽象地笼统地谈论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关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其实并非两个对等的范畴。就历史而言,科学理性是西方的产物,而人文精神则为人类所共有”。“它们之间既不存在比较的前提,也不存在比较的基础,这是两个全然不同的范畴,不具备可比性。”^[5](第12页)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关系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来谈。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人文精神大体分为四种类型,即西方近代的人文精神、西方现当代的人文精神、中国古典的人文精神、中国现当代的人文精神,西方近代的人文精神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精神正处于同一的历史发展阶段上,而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更加接近于西方近代的人文精神。我们通常所讲的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实际上指的是西方近代的人文精神。因此,只有科学精神、西方近代的人文精神与中国现当代的人文精神之间才具有比较的可能性。

从实践方面和抽象的人文精神来看,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是统一的。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6](第128页)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是统一的,作为这两种学科精华的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也是统一的,二者统一于人的生活世界和实践活动中。虽然自然科学主要关涉事实,人文科学主要关涉价值,但这并不等于说科学理性不能运用于人文科学领域,也并不等于说人文精神不能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现代兴起的一些交叉边缘学科,例如科学技术伦理学、环境资源法学等就是科学理性运用于人文科学领域或人文精神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结果。

在科学理性与西方近代的人文精神的关系方面,两者本来是同一个东西,两者之间是二而一的关系。谈论二者的“对立”、“融会”、“整合”等问题都没有意义。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是近代西方在反对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的过程中孕育出来的同一个东西。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人文主义者同时就是自然科学家。在文化上,他们反对神性,高扬人性;反对虚幻的来世幸福,追求今世的生活享受;反对封建专制,倡导民主政治。在实践方面,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证明了《圣经》中的某些谬误,使人文主义者更加坚信人的价值和力量。因此,西方近代的人文精神一开始就是遵循着一种科学的精神而发生的。从历史总体来看,人文精神作为一条绵延不息的历史河流,在不同的阶段向人们展示出不同的风貌。那么,科学理性就是西方人文精神在近代的表征,或者说,是科学理性是西方近代最基本的人文精神。这便是把科学理性从西方近代的人文精神中独立出来加以单独研究的原因之一,正像我国法律为突出海洋的重要

性和独特性,把海洋从水中独立出来,分设《水法》和《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一样,把科学理性独立出来是为了研究科学理性的重要性和独特性。科学理性和西方近代的人文精神这一统一的整体构成了工业文明的精神文化,并成为工业文明最根本的内在动力。这两种精神一方面刺激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一方面使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和创造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因此,没有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也就没有工业文明。10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目标迟迟没有实现,其原因之一就是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始终没能成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

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之核心地位的确立为什么举步维艰呢?回顾一下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发现其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的现代化是外发的、被动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之所以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完成并达到发达的状态,就在于他们的现代化是自发的、主动的。在封建社会的末期,西方国家已孕育出了成熟的资本主义萌芽,在生产方式上已初具工业社会的雏形;在思想文化领域,普遍出现了反对封建专制和神学统治、要求高扬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思潮。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彻底消解了封建制度下的农业文明,成为社会价值观念领域的核心。然后或者通过自上而下的温和改革,或者通过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确立起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这样,西方国家从经济基础到政治制度再到思想文化,都经历了一场彻底地清洗和变革,整个社会轻装上阵,迅速实现了工业化。相比之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要艰难得多。在生产方式上,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并未孕育出成熟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思想文化方面,从未出现过对农业文明造成彻底冲击的思想解放运动。从19世纪末到现在,中国几乎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初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战争状态下既无暇顾及经济,亦无暇解放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国内,政治包办一切;在国外,西方国家从军事侵略到经济封锁再到冷战,一直在对中国施压。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得到解放,价值冲突和价值危机突显出来,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价值输出和文化侵略,中国现代化的每一步都面临着重重阻力。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传播也面临着重重阻力。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虽然早就传入中国,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它才在真正意义上参与了价值观念的竞争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

然而,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直到今天都未取得核心地位。这是因为它一方面冲击着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被消解。这种消解的力量首先来自于传统农业文明。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的历史,比任何国家都长,强大的农业文明和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构成了工业文明的强大阻滞力。农业文明根植于自然经济之上,以人与自然的、自在的、原始的合一为内涵。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本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社会关系主要靠传统、风俗、习惯、经验、天然情感、血缘等自然自在的文化基因来维持,国家也是建立在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通过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基于自然血缘关系和天然情感的伦理纲常的强调,进一步确立了“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的主导地位。封建宗法社会和儒家文化都具有自在性、封闭性和重复性的特征,从而产生出重伦理不重科学,重经验模仿不重理性思维、重品德不重创造才能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恰恰以抑制人的个体性和主体性为特点,它与提倡个体性和主体性为特点的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在传播时,总是受到农业文明和儒家文化的抵制和消解。

消解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另一力量源泉是后现代文明。后现代文明与现代文明几乎同时传入中国,“否定性的后现代话语反应了人们对后现代社会发展轨迹的悲观情绪……为处在现代世界终结点上的西方文明构想了一种危机。”^[7](第19页)后现代文明以消解主体性、解构自我、重建人与自然的统一为特征,它是与工业文明对立的另一种文明形态。近年来,生态文化、技术批判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日益成为哲学界和文学界的热点。这种后现代文化虽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却使我国刚刚兴起的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又趋于消解。

要在中国尽快实现工业化,首先要为工业文明的发展扫清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批判地扬弃农业文明和后现代文明,同时综合运用教育、政策、舆论、经济、法律、行政和实践等手段对中国大众进行思

想启蒙,从而尽快确立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之核心价值观念的地位。

(二)集体主义价值观导向的重建

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只能解决工业文明发展的动力问题,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工业文明来说是不够的。因为社会主义工业文明不仅是个生产力问题,还是个社会发展方向问题。生产力上不去,是社会主义工业文明建设的失败,发展方向偏离了社会主义轨道,同样是社会主义工业文明建设的失败。

要实现我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顺利完成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必须引进工业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这种核心价值观念所内蕴的一些理念,如:崇尚理性和逻辑思考的力量,主张客观地看待事物,追求客观事实,注重个体的存在价值和个性的张扬,追求现世的生活享受等,对于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其中的一些理念发展到极端,就会出现物质拜物教和极端个人主义,从而导致社会冷漠、精神生活的平庸化、短期行为、欺诈坑骗的流行、环境问题、生态破坏等社会问题的滋生蔓延。西方后现代主义正是在批判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等思想又为西方后现代思潮提供了某些启发。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目前尴尬的历史处境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它使得我们在引进西方近代核心价值观念的同时,能够有意识地设法减轻甚至避免它所可能引起的负面影响。

那么,如何减轻甚至避免工业文明核心价值观念所可能引起的负面影响呢?这个问题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也就是,如何处理工业文明核心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呢?

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化的一种批判心态,但是后现代主义并不能根除现代化的病灶。尽管如此,它却促使人们更加理智而全面地看待现代化与工业文明,它的某些观点也确实有利于减轻现代化所带来的某些病状。例如,生态哲学所倡导的整体论和有机论,已经被经济学所吸收,形成了循环经济学;与环境科学相结合,形成了环境资源法学。而且,循环经济学与环境资源法学不单单是一种学科思想,而且已经作为一种生产理念和部门法律进入实践领域。工业文明的价值体系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并不是没有可能把它的有益成分吸收进来。

西方近代的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主张以个人价值为本位,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后者主张以社会人格为本位,本质上是一种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本质上是集体主义价值观,资本主义价值观本质上是个人主义价值观。集体主义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8](第175页),二者之间对立的实质是利益归属孰轻孰重的问题,而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并不是绝对对立的。社会总是由个人构成的,个人也总是社会中的个人。既然工业文明的价值体系可以吸收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成分,那么未尝不可以吸收中国传统的思想成分。笔者反对“整合”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笼统提法,却主张对工业文明核心价值观念与集体主义价值观念进行整合。要确保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重建集体主义主导价值观念。因此,在引进工业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时,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把集体主义吸收进来,作为社会主义工业文明建设的主导价值观念。南街村的实践不就是这种成功结合的例证吗?

重建集体主义主导价值观念也是基于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双重性,即它同时具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相互冲突的倾向。一方面,它本身以人的依赖关系的解体和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为前提,以追求经济主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包含个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它以社会主体间的分工合作相互需求为前提,又含有产生集体主义的可能性。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经济强化了市场经济固有的个人主义倾向,从而产生了个人主义的主导价值观念;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利于市场经济中集体主义的成长,从而产生了集体主义的主导价值观念。但是,公有制并不能根除个人主义倾向。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形式,以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方式,更为个人主义的滋长提供了空间。目前在中国泛滥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就是个人主义滋长的表现。坚持集体主义的主导价值观念的地位,是中国一项应当常抓不懈的任务。

由于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人们对计划经济体制下集体主义的误解和厌弃,集体主义在当今社会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主导作用。要重建集体主义的主导地位,首先要批判计划经济时代极端化的集体主义,重新理解和阐发集体主义的涵义,构建“真实的集体主义”。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体主义是一种极端化的集体主义,它片面强调集体的至上性和绝对性,严重忽视个人的存在,不能实际地满足个人的正当需求,这必然迫使个人自己去关心自己,脱离集体去谋求自身的发展,这时的集体也只徒具其表,成为“虚假的集体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下“真实的集体主义”应该是这样的,它是关于集体和个人关系中把集体利益放在头等重要地位的一种态度、倾向和信念,并不是只承认集体利益,不承认个人利益。集体主义主张集体和个人不可分离,集体由个人构成,尊重、保护和发展个人的正当利益是集体主义的内在要求;同时,个人利益只有与集体利益相结合,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和实现。集体主义代表个人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应当在兼顾二者利益的同时,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集体主义应该做到两个转化:一是“明确化”,即不仅要明确个人对集体的义务,也要明确集体对个人的义务;二是“普遍化”,即集体主义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理想,而与每个人切身相关。只要个人在实现个人合理利益的同时,能够兼顾或不损害他人、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利益,就是坚持了集体主义。

三、转型时期新价值观体系的重建

上面探讨了我国转型时期价值冲突的主要根源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急需的核心和主导价值观念。那么,应该如何建构新的价值观体系呢?笔者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对科学理性、人文精神和集体主义进行整合

工业文明既有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也有社会主义工业文明。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作为工业文明核心价值观念的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也有自身的弊端。科学理性往往注重短期和局部的效益,而忽视社会的长远和整体效益。科学理性的滥用导致了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从而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现象。人文精神对于人的个体性和主体性的高扬如果走向极端,就会导致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使人处于孤独、异化和片面的异化状态。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这些弊端恰好可以用集体主义来修补。集体主义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坚持集体主义有助于消除市场经济下的近视和急功近利,也有助于抑制个人主义的滋长。集体主义不能为工业文明的发展提供动力,而只能保证方向;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不能保证工业文明发展的方向,却能够提供内在动力。因此,通过整合科学理性、人文精神和集体主义,以前者推动工业文明,以后者引导工业文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就能够顺利进行。

(二)对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进行整合

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这三种文明形态在中国同时存在,从不同的角度冲撞、挤压、困惑着中国民众。这三种文明都有着各自的价值,也有着自身的弊端。我国社会转型的实际需要决定了我们不能对三者同等视之,而应以吸收工业文明为重点,以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为核心。同时,“我们必须从总体上和根本精神上把中国传统文化‘悬置’起来,同时拒斥后现代文化的总体的和普遍的介入”。为了减轻甚至避免工业文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还必须“在总体上和根本精神上‘悬置’和拒斥中国传统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前提下,……有条件地吸收这两种文化精神中的具体的积极的要素”^[9](第8页)。

(三)建立以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多元并存的价值观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体系是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系统,这是由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基础结构的变化引起的。目前我国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除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外,我国还存在着个体、私营、三资企业、混合所有制经济等多种所有制成分。所有制主

体的多元化导致利益的多元化,利益的多元化又导致了价值观的多元化。因此,价值观的多元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价值观的多元化一方面拓展、丰富和深化了原有的价值观内容,使价值评价标准更为全面;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多种不同性质价值观并存的局面,并引发了价值冲突和价值危机。只有用工业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和集体主义的主导价值观念对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进行整合,才能走出当今价值冲突和价值危机的困境。

[参 考 文 献]

- [1] 陆学艺,景天魁.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
- [2] 兰久富. 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 [3]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4] 赵光武,黄书进. 后现代主义哲学述评[M]. 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
- [5] 王晋中. 对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思考[J]. 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2).
- [6]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7] [美]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 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 [8]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9] 衣俊卿. 论社会转型时期的生存模式重塑——关于价值重建与文化转型的深层思考[J]. 北方论丛,1995,(4).

(责任编辑 严 真)

On the Cause of Values Conflict & Values Reconstruction in Society Converting Period

JIANG Xi-run, WANG Man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JIANG Xi-run (1955-),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epistemology, humanity and axiology; WANG Man (1982-), female, Graduate,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humanity, axiology.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period, there are three causes of values conflict in the society converting time of our country. During this time, two problems must be settled, the first is the motivity of market economy and the second is the direction of market economy. This dissertation discusses the two problems and tries to find a way to walk out of the queer street of current values conflict.

Key words: society converting time; values conflict; values reconstruction